

海德格尔哲学的康德传统溯源

吴小翠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1日

摘要

本文以康德遗留的二元论鸿沟问题为主线, 旨在梳理康德之后从新康德主义的李凯尔特、拉斯克历经胡塞尔至海德格尔对这一问题的解答, 对海德格尔和康德哲学思想之间的交汇之处进行溯源, 以论证海德格尔在内在方法论上继承自康德传统, 二者仍然在讲同一种哲学语言, 其思想并非离经叛道的“首创”, 而是源自更宽广的理论背景。

关键词

海德格尔, 康德, 新康德主义, 现象学

Tracing the Kantian Tradition in Heidegger's Philosophy

Xiaocui Wu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Received: March 17, 2026; accepted: April 7, 2026; published: April 21, 2026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dualistic gap problem left by Kant,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responses to this issue from figures such as Rickert and Lask of Neo-Kantianism, through Husserl, to Heidegger. It traces the intersections between Heidegger's and Kant'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to demonstrate that Heidegger, in terms of his underlying methodology, inherits the Kantian tradition. The two still speak the same philosophical language, and Heidegger's thought is not a heretical "original creation" but rather originates from a broader theoretical background.

Keywords

Heidegger, Kant, Neo-Kantianism, Phenomenolo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被其同时代的逻辑实证主义论敌讥讽为一种蹩脚的艺术，一种人生态度的表达；而康德哲学却因其浓厚的逻辑和数学气质获得了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敬意和推崇。那么，在海德格尔和康德之间，真的是艺术和科学的巨大鸿沟吗？二者之间的汇合之处是否有迹可循？

哲学史上，时代留给康德的难题乃是由于观念论和经验论极端发展带来的知识大厦被摧毁之危机。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康德提出了范畴的先验演绎：利用感性直观的时空结构做中介，借助于图形化，为纯逻辑形式赋予时空内容，纯逻辑形式成为范畴，从而为经验和知识奠定客观可能性。然而这一解决方式也辟出了新的裂隙，即知性的逻辑能力与感性的直观能力之间的二元论鸿沟。针对这一难题，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拉斯克和胡塞尔纷纷给予了回应，海德格尔诸多前辈的回答作出了总结和批判，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2. 西南学派进行的尝试

对于康德的二元论，海德格尔的导师，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领军人物李凯尔特表明了拒斥的态度。李凯尔特坚持纯粹形式逻辑的一元论，而海德格尔早期也曾追随其后对“纯粹逻辑”进行捍卫。但是，李凯尔特的观点渐渐呈现出一种类似于观念论所面临的困境，对此他曾诉诸“先验心理学”“先验主体”解决这一难题，但并未成功。除了以李凯尔特为首的西南学派，新康德主义的另一个学派则是以赫尔曼·柯亨、保罗·纳托尔普及卡西尔等人为代表的马堡学派，两个学派的观点既有共通之处，又有分歧。共通之处在于二者都遵循一元唯心论，拒斥纯直观的时空结构的独立性，拒斥图式理论，认为使得认识对象成为可能的先天形式结构本质上是非时空的，必须完全来自知性的逻辑能力。而二者的分歧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第一，纯粹逻辑领域与数学之间的关系；第二，纯粹逻辑领域与感性杂多之间的关系；第三，纯粹逻辑领域与价值领域之间的关系。

对上述三个问题，李凯尔特持以下立场。第一个问题，李凯尔特坚持数学的非逻辑性，依照亚里士多德的同一与差异的纯对称关系的形式逻辑，数学是不对称的，因而是非逻辑的；第二个问题，纯粹逻辑领域与感性杂多领域应该区分开来；由此到达第三个问题，逻辑的有效性为一般价值领域的理想性奠定基础。他说，“我们不仅要纯粹逻辑领域与经验实在的现成的、异质的、质的连续体区分开来，还要将它与数学的同质的、量的连续体区分开来。”由此可以看出李凯尔特坚持纯粹逻辑，不允许它涉足经验领域，甚至也将数学从其中驱逐出去。在强调这些基本区分和捍卫“有效意义的绝对首要性”时，海德格尔曾是李凯尔特的忠实追随者。但是，李凯尔特的这种严格区分导致了逻辑领域与时间性存在的经验的领域、心理活动的领域之间的鸿沟，似乎又要再次面临前康德的极端观念论的难题。

对此，李凯尔特打算诉诸“先验心理学”予以解决。正如他在《认识的对象》第三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正是“先验主体”，即“认知主体”或“理论主体”通过判断，将实际存在的世界即存在领域与有效性的世界即逻辑领域结合在一起^[1]。在“先验心理学”的意义上，李凯尔特和胡塞尔现象学以不同的路径达到了某种一致，皆追求纯粹逻辑的绝对确定性，主张将其与心理-生理活动相分离，因而主要论敌都是作为经验科学的心理学。李凯尔特曾受到胡塞尔的影响，是心理主义与现象学之间的过渡人物。但根据海德格尔的批判，李凯尔特由于坚持了“表象不是认识”的教条式理解，并未真正理解现象学方法

的意向性的内涵[2]。一般认为这一教条源于亚里士多德，因为他曾在《形而上学》中宣称真假不在事物中而在判断中[3]。李凯尔特据此强行区分了判断和表象，因而不能实现具有“结合”功能的“先验心理学”，从而再次陷入了困境。

海德格尔深刻认识到李凯尔特所面临的难题，并同样认为需要借助某种“先验心理学”来化解这一难题。在海德格尔看来，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乃是对这个难题最好的解答。值得一提的是，与海德格尔一样，李凯尔特的另一个学生埃米尔·拉斯克也洞察到其导师所面临的难题，他提供的答案与现象学不谋而合。

拉斯克认为康德在将认识和对象之间的隔阂桥接的过程中又开辟了新的裂痕。一方面是李凯尔特所谓的“质料逻辑”，对应于康德的范畴理论，专注于研究认识对象如何通过思想的构建活动得以实现；另一方面是“形式逻辑”，为那些必然有效、永恒不变的意义领域奠定基础[4]。康德范畴的形而上学演绎的目标是从形式逻辑中导出范畴；然而，拉斯克的观点恰好与此相反，坚持认为质料逻辑并非以形式逻辑为基础，从而形式逻辑无法派生出质料逻辑。拉斯克认为，具体的、实际的经验对象才是最根本的，相较之下，形式逻辑只是在随后的人为的抽象过程中才产生的“人工的”主观性的产物，仅作为一种人为构建的中介存在。在这个抽象的过程中，原本统一的范畴化对象才被分解为形式与质料、主词与谓词等要素。拉斯克的这种形式逻辑主观性、人工性的看法与现象学存在着高度相似性。海德格尔认同拉斯克的做法，将整个新康德主义的问题颠倒过来：逻辑形式远非本质，而只是一种人为的、派生的、从具体经验境况中抽象出来的东西。

由此，在弥合康德遗留的二元论的鸿沟的问题上，海德格尔看出李凯尔特坚持纯粹逻辑的教条之处和其先验心理学的不足以及拉斯克对此问题进行的创新回答。而为了真正地解决这一难题，海德格尔开始与新康德主义渐行渐远，走向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

3. 现象学给予的解答

胡塞尔在弥合康德难题的解决方法上与拉斯克相似，主张现象学的直接实在论的真理观，把纯粹逻辑领域和事实经验领域融合到一起，不至于落入经验论和观念论任何一方的困境之中，而这也是海德格尔走向胡塞尔的原因。

直接实在论的真理观主张，在直接的直观中，意向或意义与被意向或意指的对象之间存在直接的等同关系。胡塞尔认为，一般真理并非命题式的，而是“实事本身”，可以直接将我们关于桌子的表象与桌子本身进行比较，就如同将关于桌子是棕色的断言与桌子实际的棕色属性进行比较。因此，一般真理无需涉及传统形式逻辑所研究的结构，如主词和谓词、前提和推论等。相反，这些特定的逻辑结构仅在“范畴直观”的特殊情形中出现，此时，特定的命题意向或意义在其最抽象的形式特征中被直观地把握。在任何情况下，形式逻辑都无法成为真理的基础或解释。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先验心理学”持肯定态度。他主张，将逻辑与内心活动完全割裂可能是不切实际的，“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即逻辑是嵌在内心活动之中的。”[5]

本质直观的方法既可以避免陷入心理主义的逻辑认识论，也不会导致陷入经验研究。一方面，现象学与纯粹逻辑所研究的理想的意义领域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理想的意义通过意向活动被意识所把握，通过阐明这种意向活动的先天结构或本质结构，现象学不会陷入心理主义的逻辑认识论。另一方面，被阐明的先天结构或本质结构，由于是被“纯粹先天”地研究，本身就属于理想的意义领域，因而独立于这些结构的实际经验，由此不会陷入经验研究。正如在几何学中，现象学只对空间形式的本质感兴趣，而完全不关心哪些形式实际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在对意识结构进行本质分析的过程中，现象学对这些结构在任何实际经验意识主体中的存在也完全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只是心理现象的本质结构，即“纯粹意

识”。例如，在几何学中，我们把握了直观呈现的空间形式本质，建立了关于几何空间的先天科学。类似地，我们可以把握直观呈现的颜色或声调本质，建立关于“颜色空间”或“声调空间”的先天“本质科学”。同样，在现象学中，我们可以把握直观呈现的心理现象本质，建立关于“纯粹意识”的先天“本质科学”。

胡塞尔由此认为，现象学这门独特的先天科学可以充当一切其他先天科学的基础，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精神科学，哲学只有作为现象学才能成为严格的科学。显然，胡塞尔的“先验心理学”比李凯尔特更为明确和成功，更能够对心理现象进行细致的分析，胡塞尔现象学能够为弥合康德二元论的裂隙提供方法论上的创新。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海德格尔发现，胡塞尔的“纯粹意识”仍然是抽象的、形式的和非历史的，这种抽象性仍然无法解决变化与绝对有效性、时间与永恒之间的矛盾，也即康德的知性的逻辑能力与感性的想象能力之间的矛盾、范畴运用于实际的时空对象的矛盾。

4. “此在” (Dasein)的生存论分析的提出

受到狄尔泰的历史导向的生命哲学启发，海德格尔认为，只有通过“活的精神”，即一个能够领悟其时间—历史境遇的主体，才能实现这种真正的和解。这个主体与胡塞尔或李凯尔特所描述的“点状”主体不同，它必须是实际而具体的，必须是“流动”的。在海德格尔看来，胡塞尔“纯粹意识”的本质是纯粹的、理想的，独立于任何具体实例，包括意识本身及经验认识的对象。因此，若我们探讨的是抽象与具体、理想与实际、形式与经验之间的普遍联系，那么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不应仅仅局限于抽象的理想领域。因此，最终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提出了他自己的具体主体的“主观逻辑”以解决这个难题，即对“此在” (Dasein)进行了生存论分析。

与完全抽象的、形式的和非历史的胡塞尔的“纯粹意识”相比，海德格尔的此在有以下特征。首先，此在存在于一个给定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并非由此在自身所创造，此在被“抛入”到世界之中。因此，此在对于世界的掌控极为有限。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此在被定义为“在世界之中存在”。其次，此在与世界的关系基于实践和实用，它为了实践或实用的目的使用周围的事物。在海德格尔看来，事物原本是在实践中“上手”的，为具体筹划而使用，而非仅为理论思考而“现成在手”。理论认识是对“上手”事物的派生模式，是对更基本的实践和实用模式的一种特殊改造。最后，此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存在。此在的本质或“存在”可归结为“操心”，即前面所描述的从实践和筹划的整体视角来指向其所存在于其中的世界。操心的本体论内涵揭示了时间性的、历史的本质。因此，我们有必要清晰地将其与数理自然科学中均一旦无特征的时间概念区分开来。

由此海德格尔在构建现实而具体的主体先天分析的过程中，对胡塞尔现象学与新康德主义两大流派的术语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他通过引入“生存论—存在论”分析，替换了传统的现象学本质分析，从而超越了本质与实存之间的传统界限。这一变革为对具体实存本身进行先天分析提供了一种看似悖论式的可能性，即对具体的历史生存本身做现象学的本质分析，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视角和思考方式[6]。

5. 海德格尔与康德的交汇处

通过以上三个部分，可以看出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回答康德问题的清晰脉络。李凯尔特坚持了一元论，但由于对表象—认识的传统教条式理解，遭遇了重重困境，未能对康德问题有所突破。胡塞尔现象学方法创新地弥合了康德留下的鸿沟，而海德格尔继承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发现了先天时空直观和图形论的时间性、历史性，从而回应了康德。

与胡塞尔一样，海德格尔拒斥了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基于认知的真理观念，主张一种“直接实在论”的真理观念。与胡塞尔对意识的先天本质分析不同，海德格尔认为“直接实在论”唯有建立

在此在的历史性之上方有实现之可能，所有真理最终都源于其历史性本质。

海德格尔阐述道，传统的“真理存在问题”导向了对“理想主体”的预设，这一预设的动机源于对先天之物而非经验事实本身的要求。这种理想主体只是一个被幻想的理想化的主体，而那个纯粹的“事实的”主体中的先天之物，即此在，恰恰被遗失了；而此在才是这个“理性主体”的真正的存在论基础。海德格尔说：“主张‘永恒真理’，是把此在的基于现象的理想性同一个理想化的绝对主体混为一谈，这些都是哲学问题内的长久以来仍未彻底肃清的基督教神学残余。”^[7]根据“直接实在论”，我们的认知主体乃是一个活生生的实践主体，实践在与周围的世界和环境打交道的过程中；而传统意义上的真理只是一种衍生现象，是在一种“现成在手”的关系中指向的对象。如果我们遗忘了这种衍生关系，就会产生种种判断活动的误解，造成“表象与概念的连接和/或分割”^[7]。这就是知识的二元论鸿沟的真正起源。

康德也赞同“直接的实在论”观点，即我们借助外感觉直接认知空间中独立于我们的外部对象。康德所指的“现象对象”或“现象”，首先是指存在于时空之中的物质客体。空间和时间是直观的纯粹形式，因此它们具有先验的理想性。虽然存在纯主观的表象，即“感觉”，但这些感觉本身并不构成意识对象，只有通过感性形式与知性形式的结合，我们才能“构成”或“综合”经验的认知对象，即“现象”。因此，所有经验认识的对象，都是“被构成的”，同时也是“被给予的”。康德不认同“笛卡儿式”地将主体与其自身的意识内容相隔离的观点，他认为既不存在一个脱离世界主体的“笛卡尔式”困境，即所谓的“知觉之幕”，也不存在一个缺乏时间理想意义的“柏拉图式”难题，即所谓的“本质主义”。相反，康德通过先验图形将具体的空间-时间经验世界先天性地“构成”为直接知觉的对象。海德格尔对《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形而上学解读揭示出，或许康德本人也没有意识到，康德将感性和知性同时融入一个“共同根”，即先验的想象力，它被理解为“时间性”。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康德的时空观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这样写道：“曾经向时间性这一度探索了一程的第三个人与唯一的人，或者说，曾经让自己被现象本身所迫而走到这条道路上的第三个人与唯一的人，是康德。”^[7]

6. 结语

从李凯尔特、拉斯克到胡塞尔，可以清晰地看到海德格尔哲学的康德传统。正如他的那部巨著《存在与时间》的标题那样，海德格尔通过此在的生存论分析重新发现了存在的时间性，呼应了康德的先验时空，从而弥合了二元论鸿沟。至于海德格尔在与逻辑实证主义的论战中对形式逻辑在哲学中的首要地位的否定，与其说是从消极的意义上否定科学至上主义，不如说是从积极意义上提醒我们对存在的再度发现，即回应康德的那句：“人是目的”。

参考文献

- [1] Rickert, H. (1915) *The Object of Knowledge*. J.C.B. Mohr, 11 p.
- [2] 刘明峰. 海德格尔如何踏上现象学之路——以其对心理学及先验价值哲学的批判为视角[J]. 哲学动态, 2021(9): 72-80.
- [3]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 苗力田,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125.
- [4] Lask, E. (1912) *Die Lehre vom Urteil*. J.C.B. Mohr, 23-24.
- [5] 迈克尔·弗里德曼. 分道而行[M]. 张卜天,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37.
- [6] 迈克尔·弗里德曼, 南星. 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 达沃斯辩论与二十世纪哲学[J]. 外国哲学, 2019(2): 120-133.
- [7]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34, 227, 318.